

“全球引智”的背后

马志刚

新,人才竞争越来越成为左右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当今时代,人才层次决定产业高度,谁在人才上占据优势,谁就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在发展中掌握主动。正是因为如此,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人才战略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不遗余力吸引全球人才。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强调要加强在教育、研发、创新等方面的投入,力推“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中高素质人员长期居留”的“梦想法案”;英国规定全球50所顶尖MBA学院毕业生可直接申请高技术人才移民;法国甚至“借钱搞科研”,宣布从2010年起发行350亿欧元的国债,加强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希望筑巢引凤。

这几年来,我国在优化引才、聚才、育才环境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并受益颇多。据不完

全统计,仅2012年开展的“赤子计划”活动就吸引各类海外人才回国服务上万人次,有7000多个人才技术合作项目参与对接。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消息称,目前我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已达5500多万人。但也要看到,眼下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有二:一个是高层次专业人才匮乏,这在汽车等制造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据测算,全球主要汽车企业集团的中高级技工占工人总数的40%以上,而我国仅占4.3%。另一个是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消除,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有关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约有250万人出国留学,截至2011年回来了80万左右,我国仍属于全球人才净流出国。

人才优先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纵

览世界发展史,大国之间每一次成功的经济追赶,都同时伴随着人力资本的先行追赶。美国赶超英国就是如此。1820年,美国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英国的87.5%,1870年提高到88.3%,1913年进一步提高到91.2%。国民素质的提高,给美国经济腾飞注入了强大动力。1870年美国人均GDP还仅为英国的75.3%,但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5.5个百分点。现在,我国“人口红利”日渐式微,再继续靠低成本优势已越来越不可能了。加快经济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迫切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国内“人才红利”,以全球视野进行人力资源配置,加快塑造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这才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

热点透析 破解产业集聚区 发展难题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是创新体制机制、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客观需要,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现途径,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

产业集聚区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镇体系和自主创新体系的有效载体,对于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承接产业转移,强化创新驱动,实现节约集约发展,发挥着重要的载体与基础性作用。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是创新体制机制、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的客观需要,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在这种形势下,应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倒逼我国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将经济重心由出口转向内需,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特别是中部地区,应着力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优化资源整合、创新体制机制。

当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势头良好,其主导产业日渐明晰,产业基础日益雄厚,配套功能趋于完善,综合带动效应越来越明显,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但是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各地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条件不尽相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产业层次低、发展方式粗放、效益偏低、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矛盾与问题客观存在,制约着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当前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与挑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产业集聚区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突出。尽管有的产业集聚区已建立自己的融资公司,但前期建设投入数额往往比较大,负债运行,势力单薄,缺乏有效的融资手段,融资实力不强。二是我国正步入工业化加速阶段,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与产业集聚区项目建设用地不足的矛盾彰显。土地资源少、土地供应紧、项目落地难日益成为产业集聚区发展的制约因素。三是随着大批项目入驻产业集聚区,企业用工大量增加劳动力供给趋紧,技能型、复合型人才显得不足,专业技术人员引进难、留住难、成本高。与此同时,产业集聚区人力资源培养机制尚未形成,加之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作用更加明显,人才流动性增强,也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力资源紧张的状况;四是产业集聚区的许多企业技术创新孵化模式比较单一,创新驱动和创新发展能力有限,创新投入不足,研发成果不多,技术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扬弃传统的产业集聚区发展模式,推动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主动、赢得先机,就能更好地解决资源要素制约难题,提升集聚区节约集约发展和要素保障水平,为产业集聚区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一要加快金融通平台建设,强化资金保障。首先应尽快理顺体制,增强融资实力。理顺产业集聚区管理体制和村级管理体制改革,壮大经营性资产规模,为投融资工作提供条件。整合产业集聚区土地、房屋、道路、基础设施等经营性资产,完成优质资产注入。其次,拓展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成效。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签订授信协议,扩大融资规模。可考虑争取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支持,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发行企业债券。吸收民间资本,引导、带动、促进民间资金参与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再次,加强业务锤炼,提升融资运作水平。采取市场化选聘、专业培训等方式,进行针对性培训和业务指导,建设熟悉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队伍,提高产业集聚区融资平台人员的业务素质。

二要加快人力资源平台建设,满足人才需求。首先,建设信息平台,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依托集聚区网络系统,创建“产业集聚区人力资源信息网”,适时发布人才需求信息,为广大求职者和企业提供个性化服务,解决集聚区内企业招工难等问题,实现人才的有序流动。定期组织辖区企业联合开展人才招聘活动,为企业招工和劳动力求职搭建桥梁;其次,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解决企业用工需求。面向产业集聚区,利用雨露计划、阳光工程等各类培训补贴,全方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返乡农民工专项技能再培训;再次,强化“校企”合作,推动培训、实习、就业一体化。加大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训力度,减免实习实训基地、工厂的税费,支持大专院校与集聚区内企业联合共建实训基地和培训基地,适度采用“工学交替”模式安排大学生顶岗实习,实现技能培养与企业用工需求无缝对接;最后,引进高层次人才,解决高新技术力量不足问题。与人事、科技、商务等部门通力合作,制定优惠政策,发布产业集聚区高层次人才需求目录,建立健全人才的引进、安置、留住、用好机制,为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保障。推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市场化和职业化,提高其经营管理水平。

三要加快技术创新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首先,加大投入,建立公共创新平台。依托现有基础和产业优势,增加资金投入力度,建设科技研发的基础设施,为企业提供公共创新平台;其次,政府引导,建设企业创新平台。加强政府引导,推进以企业技术中心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加快企业研发平台的构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市场为导向,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再次,加快转化,建设产业孵化平台。按照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市场化要求,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园建设,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产业化的水平。(执笔:刘晖 翟伟栋)

跨境直接投资的机遇与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胡江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跨境直接投资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跨境直接投资继续呈现不平衡,直接投资方式更加多样化,跨境直接投资结构进一步调整。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进行了调整,这对中国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

服装制造业企业、家电产品制造业企业、部分化工产品制造业等关注中国劳动力成本、劳动者技能、劳动效率的变化,以及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区域政策,也特别关注中国各个地区产业链的配套能力。三是提升中国分公司的战略定位,提升在中国研发部门的地位或在中国设立重要的海外研发部门,加大投入力度,继续维持或者扩大中国的生产加工能力。这些主要体现在竞争十分激烈,甚至有可能成为未来技术革命的前沿领域、新兴领域,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等。

跨境投资战略调整带来新机遇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战略调整带来新机遇。

一是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将进一步显现。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不仅进行全球采购,有效配置要素和各种资源,而且掌握了先进技术、核心技术、销售网络体系;不仅满足全球需求,而且引导需求导向、创造需求,保障其生产、供给适应市场变化;不仅是全球新兴技术的倡导者、使用者,也是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的主导者。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国充分发挥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从初级产品的加工制造到现代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中国正在逐步向前发展,同时提高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虽然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但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前景仍不相适应。这说明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吸收跨境直接投资,特别是其高端产业,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

二是跨境直接投资促进自主创新。跨

境直接投资有利于提升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东道国的创新能力起促进作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发达国家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占全球总量的90%以上,而其中的主力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并逐步在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成立专门的研发机构。跨境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创新能力产生“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主要有:1、示范和模仿机制,这是最直接、简单的方式。东道国企业通过模仿跨境直接投资企业,短期内迅速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技术外溢就产生了。2、竞争机制,这是最有效的方式。面临跨境投资企业可能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本地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这样就会促进创新活动的增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3、人员流动机制。跨境投资企业在东道国开展经营活动必须雇佣本地员工,并且对这些员工进行多种技能的培训,使他们的人力资本得到提升。如果这些员工离开外企到当地企业就业或是自己创办企业,他们获得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知识就会扩散到本地企业,从而产生溢出效应。

跨境投资战略调整带来新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危机中心的美国、欧盟等国家实施了各种应对危机的措施,再制造业化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应对策略。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将影响部分高端产业活动对外转移进程和全球跨境投资规模,不利于中国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不利于中国发展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

业、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有可能将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市场环境,也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

首先跨国公司始终控制核心技术、采购、销售网络体系。跨国公司需要不断增强其创新能力和掌控其核心技术,完善其采购、销售网络体系,发挥其掌握的国际货币作用。跨国公司可能发挥其对东道国的“挤出效应”,继续保持其比较优势地位。这些途径主要有:一是技术壁垒的使用。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为在竞争中保持垄断地位,极力维持现有技术的生产能力,提高新技术的进入成本,如过度保护知识产权,拥有更多的专利技术,不利于中国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二是技术转移的限制。跨国公司的母国以及跨国公司会对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传播实施严格的控制,他们竭力地保护自己的先进技术,严格限制先进技术流出,进入中国部分技术已经是相对落后的技术。

其次,周边新兴经济体带来激烈的竞争。当前,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进一步放缓。这种背景下,以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中国周边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实行更加开放和更加优惠的引资政策、低成本优势更加突出,中国已经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跨境投资已经逐步转移到周边新兴经济体,不仅仅是增加这些周边国家的订单,而且有的跨境投资企业将其总部转移到这些国家。对于前苏联国家、东欧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但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在吸引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方面优势较为突出,也已经成为中国吸引高端产业活动的重要竞争对手。

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

金里伦

寻找一条通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之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浩荡荡荡,几代中华儿女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在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伟大传奇。理解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理解这条道路的来之不易,才能更深刻地认识、更自觉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做到坚定不移。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意志。面对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威胁凌辱,面对坚船利炮裹挟而来的工业文明,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在神州陆沉的悲痛痛苦中,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觉醒中,开始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中国道路”。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力量纷纷登场,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但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教训充分表明,中国这个古老的、落后的东方大国,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具有自己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条件,无视这些基本国情和特点,要依靠西方国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下实现民族独立显然不切实际,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也是走不通的。

当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观察分析中国的实际和问题,坚决发动并依靠人民大众共同奋斗,开创了一条由新民主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也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从此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的现代化也从此有了社会制度的基本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根本结论。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建设新社会、探索新道路的艰辛历程,相继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由于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在实践中也犯下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如大河之水川流不息,前后永续无法切断;又如登山越岭拾级而上,由低及高通往顶峰。看到过去的成绩而无视今时的超越,或者以今日之进步而否定昨日之探索,都不是理性和科学的态

度。在这一阶段,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高,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历经百余年的奋斗探索,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通往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